

德国的土耳其移民

李艳枝*

一、德国的土耳其移民的发展历程

目前,在德国的330多万移民中,土耳其移民占220万左右。德国的土耳其移民根据不同时期移民的特点可以分为劳工移民、家庭团聚移民和政治难民。*

(一)劳工移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由于经济迅速发展造成劳动力严重不足,而此时土耳其处于进口替代型经济发展阶段,发展水平相对低下,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于是在1961年同德国签订了劳工协议,由此大量土耳其人涌入德国,解决了德国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到1973年,土耳其人已经成为德国境内最大的移民群体,约占23%;到1987年,这一比例上升到34.3%,人数达1453700人之多。这些劳工呈现以下特点:首先,大多数穆斯林移民来自土耳其经济落后、伊斯兰意识浓厚的农村地区,由于凯末尔的世俗主义改革主要在城市和上层精英分子中推行,对农村和边缘地区的农民触动不大,因而这些移民将浓厚的伊斯兰传统带到移居的德国工业发达的大城市,这是伊斯兰教组织在这些地方具有较强活力的重要原因。其次,他们大都是年轻的单身男性,没有受过任何技术培训,作为非熟练工人主要从事制造和建筑等技术含量较低的行业。再次,他们大都居住在临时的工棚、廉价的旅馆,除了雇主,他们与当地的德国人没有多少交往和联系。因此,德国此时把劳工招募作为一个短期临时性的劳动力解决方案,认为他们到德国的目的是为了打工挣钱,而不是为了移民。

(二)家庭团聚式的移民。欧盟大多数成员国原则上承认合法移民享有和家庭成员团聚的权利。在《欧洲人权公约》、《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赫尔辛基公约》中都呼吁尊重家庭团聚。在这样的背景下,虽然

德国对劳工的需求减少,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土耳其人以家庭团聚的方式移民到德国,家庭的稳定使他们在德国定居下来,也使得德国土耳其移民的人口构成发生巨大变化,增加了无经济能力依赖性移民的数量,改变了移民中男女的性别比例,妇女人口大量增加,佩戴面纱和头巾的穆斯林妇女随处可见,移民的伊斯兰特性更加明显。到20世纪90年代初,土耳其移民已经翻了一番,占德国的外来移民的30%,是德国最大的少数民族群体,2/3以上的土耳其移民不足30岁,其中大部分是在德国出生和成长的。

(三)政治难民。1993年前,德国基本法的第16条规定,“受到政治迫害的人享有政治避难的权利,并在等待申请结果时可以享受相对慷慨的社会福利”。因而德国成为政治避难者相对具有吸引力的欧洲国家。20世纪80—90年代,虽然土耳其国内政局相对较为稳定,但由于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联合政府中各政党的权力角逐,库尔德分离主义运动日益猖獗,加之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由于经济、政治原因,向德国寻求避难的土耳其难民移民不断增加。据有关资料统计,2002年申请德国难民身份的土耳其人为9575人,2003年为6301人。

二、德国的土耳其移民处境

在德国的土耳其移民的处境长期不佳。首先,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并不能获得与德国公民同等的

* 作者简介:沈阳师范大学(助理研究员)。

David Horrocks and Eva Kolinsky eds., *Turkish Culture in Germany Society Today*, Berghahn Books, 1996, p. 19.

Kürsat —Ablers, Elcin, “The Turkish Minority in German Society”, in David Horrocks and Eva Kolinsky eds., *Turkish Culture in German Society Today*, Province and Oxford, Berghahn Books, 1996, p. 119.

陈南雁:“欧洲移民问题及移民政策的趋势分析—兼论德国在欧洲移民政策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德国研究》,2006年第2期,第37页。

宋全成:“简论德国移民的历史进程”,《文史哲》,2005年第3期,第91页。

教育机会,他们主要接受普通教育,很少有上大学的机会。由于不能获得平等的公民权,因而他们即使出生在德国,也被看作外国人而不得不与那些来自境外的留学生一起竞争相关指标,这就造成土耳其移民的就业面较窄:女孩子一般从事美容师和药剂师的工作,而男孩子则大部分集中于金属加工和电气等行业(详见下表:德国人和土耳其人在劳动力市场处境比较),工资收入较低。

德国人和土耳其人在劳动力市场处境比较,1984—1992(%)

职业地位	1984年		1992年	
	德国人	土耳其人	德国人	土耳其人
非熟练工	4	37	4	21
半熟练工	12	42	11	42
熟练工	18	13	21	22
一般白领	9	4	5	3
高级白领	33	2	37	4
自主经营	12	2	12	8

由于土耳其移民的教育水平远低于德国人,因而在劳动市场上处于劣势,竞争力不强。较高的失业率、过低的职业地位和狭窄的就业范围等因素使土耳其移民的人均收入只相当于德国人的一半,也低于非德裔人口的平均水平,穷人的比例是德国人的3.5倍,远高于德国的非德裔的平均贫困率(详见下表德国人、非德裔人、土耳其人的贫困化比率)。

德国人、非德裔人、土耳其人的贫困化比率(%)

年份	非德裔穷人	就业的非德裔穷人	土耳其穷人	非土耳其穷人	德国穷人	就业的德国穷人
1984	21	15	30	14	13	9
1989	24	22	38	17	11	8

其次,面临着社会地位和权利的边缘化局面。土耳其移民在住房和收入方面远远落后于德国人,并且享受不到必要的社会福利制度,由于他们害怕会被从自己居住了大半生的地方赶走,甚至不敢寻

求救济。“通过对移民地位的明确化,德国的福利制度将外国人排除在受益之外,而这本来是一个现代国家应该提供给每个定居者的。”他们虽然经过斗争取得就业、住房、教育和福利方面的一些权利,但实际地位却与德国公民有着本质差别,其结社和政治言论自由也受到一定限制,在国家机构中几乎没有代表权。另外,由于没有政治发言权,他们就没有积极性去成就公民责任感,他们与土耳其国内的联系却愈益密切,这就为德国的土耳其伊斯兰组织超越国界在国外寻求支持提供了有效的平台,而在德国的穆斯林中间出现土耳其国内宗教团体和组织的延伸也就不足为奇了。

再次,还要面对德国不断升级的排外暴力。德国人将经济衰退带来的社会经济弊端如失业、住房短缺和社会保险降低等都归咎于移民,指责他们对德国的民族完整性构成了威胁,因而出现强烈的排斥移民的情绪。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发生了多起针对移民的暴力袭击事件。德国统一之后,这种排外情绪非但没有平息,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他们提出“德国是德国人的德国”、“外国人滚出去”等口号,将暴力袭击的矛头指向移民,作为德国最大的移民群体,土耳其人首当其冲。1993年4月,索林根的新纳粹主义分子焚烧了一座土耳其人房子,酿成一名妇女和三名儿童死亡的惨剧。1993年12月,又有两名土耳其人被极端分子杀害。

最后,土耳其移民深受德国融合政策的影响。在排斥移民的同时,德国一些高瞻远瞩的官员认识到解决移民问题对于德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于是提出移民融合的发展战略。1978年12月,德国联邦政府任命了一个有关移民问题的联邦专员,专门从事移民融入德国社会的工作。土耳其移民在德国政府意识形态的同化下,他们传统的价值观念开始逐渐受西方思想浸染,土耳其语言也带有浓厚的德语痕迹,第二代、第三代移民甚至将德语而非土耳其语作为日常用语。面对这样的现实,土耳其移民也认识到认同德国社会的重要性,认识到必须融合到主

David Horrocks and Eva Kolinsky eds, *Turkish Culture in Germany Society Today*, Berghahn Books, 1996, p. 95.

同注,第120页。
同上。

体民族的文化中去,才能真正维护自己的利益。根据一项调查,只有 13% 的土耳其穆斯林主张与德国人保持隔离状态,而 33% 的人则表达了与德国人比邻而居的愿望。同时,也有 9% 的德国人主张和土耳其穆斯林混居在一起。这表明了土耳其移民在认知态度上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并且将加快土耳其移民融入德国社会的步伐,进而获得相对平等的公民权。此外,德国 1990 年修订的移民法、1993 年的移民协议、2000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新国籍法和 2005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移民法实际上大大降低了外国人获得德国国籍的门槛。目前,德国政府也接受了德国已经成为一个非典型意义上的移民国家的现实,这无疑为土耳其移民边缘化处境的改善提供了重要条件。

三、伊斯兰教与德国的土耳其移民

在德国的土耳其移民均是穆斯林,伊斯兰教在维持他们相关的生活习俗、巩固宗教意识和增强凝聚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如何通过伊斯兰教来融合土耳其移民,对德国政府来说也是一种挑战。于是,德国政府一方面因势利导,出台措施,规范土耳其移民,使之融入德国社会;但另一方面又因对移民本能的排斥,使土耳其移民边缘化的感觉并没有根本改变,从而又使他们与母国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并传承着本土文化。

(一) 让土耳其移民享有相对独立的宗教教育。很长时间以来,德国的公立学校中几乎不设伊斯兰教育的课程,但在穆斯林的努力下,德国地方政府的宗教教育政策开始松动,比如在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就率先向穆斯林学生提供了伊斯兰教义课。该课程的教科书由州的教育部门统一印制,带有鲜明的伊斯兰特色,扉页上印着:“除安拉外,别无神灵。”正文附以标准的阿拉伯文祈祷词:“以至善至慈的安拉的名义。”六年级的教科书则希望学生接受《古兰经》的真理,将其作为行为准则。在汉堡,州政府采取了将不同宗教信仰结合起来设立一门宗教课的办法来提供宗教教育。在柏林,地方议会与土耳其官方达成协议,从 1984—1985 学年开始,土耳其学生每周接受两个小时的伊斯兰教育,由来自土耳其

的教师讲授,教材也由土耳其提供。

德国政府还将自由民主和西方的价值观纳入宗教教育中,试图寻求伊斯兰教育和西方社会的契合点,在不伤害穆斯林宗教感情的前提下,帮助穆斯林移民理解和接受德国的社会价值和道德规范,以解决由于宗教信仰和道德原则差异所带来的社会紧张等问题,促进社会融合。

(二) 让伊斯兰组织发挥巨大的社会整合作用。随着家庭团聚和穆斯林聚居区的形成,土耳其移民对宗教的兴趣和对宗教场所的需求开始上升,第一批正式的位于被废弃的工厂或住所旁边的清真寺得以建立,许多伊玛目从土耳其来到德国,主持基本的宗教事务,另外还建立大量的伊斯兰活动中心。据统计,德国目前有大约 1350 所清真寺和礼拜中心。另外,在土耳其移民中还出现代表特定阶层利益的由私人设立的伊斯兰组织,他们主要扮演社会支持与物质援助者角色。这些伊斯兰组织和机构还致力于促进土耳其穆斯林融入德国社会和提高其社会、法律地位,它们在住宿、招工、种族主义和歧视等问题方面积极与德国当局交涉,还提供一系列社会服务:举办夏令营、运动俱乐部、业余无线电课程、计算机训练、手工艺、学生家庭辅导、法律援助、学校和工作场合援助、翻译服务和性教育等。这些组织和机构主张平等、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原则,它们认同国际伊斯兰共同体——温麦,忠诚于伊斯兰原则,并使其在非伊斯兰的环境内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许多还建立了专门的教职人员培训机构。总之,这些伊斯兰组织保护和稳定了穆斯林社区;维持和传承了本土文化,在加强其成员的穆斯林认同的同时又为其成员融入主流社会提供帮助,既整合了土耳其移民的力量,又在某种意义上充当了沟通穆斯林社区和德国社会的桥梁作用。

(三) 土耳其移民深受母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土耳其移民深受母国新闻媒体的影响,自 1970 年以来土耳其的主要报纸就在(下转第 27 页)

David Horrocks and Eva Kolinsky eds., *Turkish Culture in Germany Society Today*, p. 95.

Tomas, Georg, Lithman eds., *The New Islamic Presence in Western Europe*, Nansell Publishing Limited, 1998, p. 86.

Eva Ostergaard Nielsen, *Transnational Politics: Turks and Kurds in German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 56.

印度独立以后,长期没有明确的侨务政策,20世纪90年代经济改革后开始重视海外印度人,推出了一系列大胆的海外印度人政策,但由于操之过急,在印度国内外引起了一些争议。这些政策上的偏差可能会挫伤海外印度人的积极性,进而影响海外印度人对印度经济的贡献。比如,2003年印度政府制定的双重国籍只给予西欧、北美、澳大利亚等少数富裕国家的海外印度人,这对加勒比海地区、非洲和北欧国家的广大海外印度人而言就是一种政策上的歧视。因此,有人号召:“所有自重的海外印度人都应该唾弃此政策。”尽管印度政府很快对这一政策作出调整,但这种偏差的影响并不能立刻消除。

(四)从印度流出的侨汇也在逐年递增。印度是个移民输出大国,同时也是一个移民输入大国,每年有几百万移民涌入印度。2005年印度外来移民总

数为570万,占其总人口的0.5%。十大外来移民来源国为: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缅甸、中国、马来西亚、阿联酋、阿富汗和不丹。外来移民数量的增加使从印度流出的侨汇也在逐年递增,2000—2006年从印度流出的侨汇总额就达72.73亿美元,年均增长21.71%。由此可见,伴随着印度侨汇收入的飞速增长,从印度流出的侨汇也在成比例地增长,印度的绝对侨汇收入并没有印度政府及许多机构所统计和宣传的那样大。

总而言之,尽管近几年来印度侨汇收入都高居世界榜首,每年侨汇都在增长,但由于印度主要移民输出地区——海湾国家局势动荡,欧美国家经济不景气,再加上印度政府海外印度人政策的偏差等诸多因素影响,印度侨汇收入的增长势头并不乐观。

(上接第22页)德国印刷和发行,其中包括具有民族自由倾向的《自由报》、关注社会民主的《国民报》、坚持伊斯兰立场的《民族报》和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翻译家报》等。土耳其的中央电视台和私立电台如Euroshow、Eurostar、EuroD、EuroATV、TGRT、Kanal7、HBB等都通过光缆和卫星向海外的土耳其移民传送节目,从而强化移民的祖国认同感和民族意识。土耳其官方和民间的伊斯兰组织也在德国设立了许多分支机构,而且许多土耳其伊斯兰主义者将德国穆斯林社团作为自己的庇护所,为其政治活动提供某种支持。最大的非政府伊斯兰组织——德国伊斯兰联盟的大部分成员与土耳其的伊斯兰政党关系密切,相当于政治伊斯兰组织在海外的分支机构,一些成员还曾当选为土耳其议员。作为土耳其民众伊斯兰复兴运动代表的努尔库运动在德国设立了大约200所学校,传播该运动创始人努尔西的基本思想。另外还有著名的纳格希班底教团的苏莱曼斯勒(Suleymancilar)分支在德国成立的伊斯兰文化中心,拥有160个清真寺和134个穆斯林社区,其影响力和分支机构分布于欧洲许多国家。尽管这些宗教组织满足了土耳其穆斯林移民的宗教需求,加强和巩固了他们间的凝聚力和组织性,但因其强烈的宗教

色彩和对土耳其国内政局的过分关注,也遭到德国官方的反对。德国的土耳其穆斯林移民在融合的过程中,还要面对来自德国右翼党派及社会团体的歧视和攻击,还要正视由于种族的偏见和文化的差异引起的反感,还要直面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和经济利益上的矛盾所产生的抗拒,还要应对来自国际社会各个层面挑战和压力,但其融入德国主流社会的发展趋向是不可逆转的。

C. Rammanohar Reddy, "Citizenship with Dollars and Pounds", *The Hindu*, 19 January, 2003, <http://www.hindu.com/thehindu/mag/2003/01/19/stories/2003011900230300.htm>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Factbook, Compiled by Dilip Ratha and Zhimei Xu,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Team, Development Prospects Group, World Bank, <http://www.worldbank.org/prospects/migrationandremittances>